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地方知识与文化形构

——20 世纪陕西文学、区域文化研究的一种思路

赵 林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 区域文化研究的两种模式以及与之对应的文学史观的某些缺陷,使得吉尔兹的“地方知识”与区域文化研究成为可能。“地方知识”将文学视为一种文化符号体系,强调用“深度描写”细读文本及相关文化行为,力求呈现每一种知识的形成与特定历史情境的关联。同时,吉尔兹还主张用一种“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来观察文化,强调文本阐释者的“主体参与性”。由此观察作为一种“地方知识”的“三秦文化”,不仅可看到其自古以来的“传统”,还能通过“深度描写”捕捉到它得以形成的具体语境。“三秦文化”视野中的文学,可视为“三秦文化”作为一种地方知识的文本性符号。如此既拓展了“三秦文化”的影响范围,又在全球化语境下凸显出“三秦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性审美体验的价值。

关键词: 地方知识; 区域文化; 20 世纪陕西文学; 全球化语境

中图分类号: I206.6; G12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14)01-0072-08

收稿日期: 2013-03-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ZW072); 西北大学科研基金项目(2011)

作者简介: 赵林,男,河南正阳人,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化知识流动、理论范式相互影响的趋势日益增强,各国、各民族、各区域开始了对自我身份的重新确认以及本土文化的坚守弘扬。“全球化,这在过去的十年里作为一种变化的范式——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想象——已经取代了现代化。”^[1]“全球化”这一概念被频繁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引发了社会文化结构与研究范式的嬗变。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而言,“全球化”语境促成了特色鲜明的“地域体验”与区域文化的书写。我们熟知的“京派”、“海派”和“陕军”、“湘军”、“豫军”、“川军”等称谓一起构成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多元格局。面对这一语境,陕西文学及其研究者如何更好地确认自身的主体性,同时又要避免划地为限的自我封闭以及随波逐流的盲动,便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尝试梳理区域文化研究的脉络,一方面对区域文化研究的两种模式进行分析,另

一方面探讨吉尔兹的“地方知识”概念在区域文化研究中的可能性。其次,在此研究背景下,力求把 20 世纪陕西文学放在一个相对宏观的比较框架内,以具体、扎实的个案来概括区域文化研究的思路。

1 从既有研究成果看,区域文化研究的两种模式也反映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范式嬗变的历程。其中,“地域文学研究模式”对应着以线性历史发展观为主线的文学史观,“区域人文学研究模式”恰恰对应着以空间观为基点的文学史观。应当说对文学的地域性问题,我国传统文论和 19 世纪文学史家丹纳等均有所论述,如将地理环境视为决定文学风貌和品格的重要因素之一。1986 年,金克木提出了“文艺的地域学研究”的设想:

我觉得我们的文艺研究习惯于历史的线性探索,作家作品的点的研究;讲背景也是着重点和线的衬托面;长于编年表而不重视画地图,排

等高线,标走向、流向等交互关系。是不是可以扩展一下,作以面为主的研究,立体研究,以至于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研究呢?假如可以,不妨首先扩大到地域方面,姑且说是地域学(Topology)研究吧。^[85]

这一思路认为可以从文艺的地域分布、文体和风格流传的地理轨迹、文艺的传播等方面展开讨论。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1990年代严家炎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丛书总序指出现代区域文学研究的视角与传统文论的差别在于,特别注重一定区域内人文环境对文学发生发展的影响,多就区域典型的文学意象和特征展开论述,如从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归纳出区域文化的某些特征,然后来与作家的创作风格一一印证。从方法论层面看,这种研究模式的特点与“地域文化”相近,其局限性表现在:首先,按照地域文化的各子系统来论证其对文学的影响,但在论证某一地域文化与作家的创作风格时,易陷入从此概念到彼概念的逻辑推演,缺少对作家创作特定情境的考量,有主观臆想的嫌疑。其次,“区域视角所能提供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现实的背景,及社会结构中各子系统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因而无法体现”^[7]。在此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区域文化认同也需要诸如地理环境、语言等客观的物质文化基础。至于这些物质文化因素如何被整合到区域文化知识内部,则与近现代中国转型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

这种凸显着福柯后现代史观影响的思路来自于历史学、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他们认为区域作为人文地理学上的概念,除了用来指一个具有特定的位置和共同的特色的(包括自然方面的和人文方面的)客观存在的地理单元外,还指一种主观建构,是个人或某一群体面对区域时,形成的一种文化认同,一种对特定文化身份的归属感。也就是说,完整的地理区域概念是客观的物质环境与人们主观建构相结合的产物,区域研究取向的重心从“着重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分工与整合,转移到着重区域身份和意识的建构”^[29]。程美宝通过晚清以来不同社会阶层人士对于“广东文化”这一概念的不同表述,考察“广东文化”如何被知识分子生产出来,以及在此过程中国家认同又怎样和地方知识的形成过程纠缠在一起。因此,区域文化形成有一个具体的社会广泛接受过程,与一个具体的个人和群体的深层意识和心理积累的过程,基于此形成区域的“想象的共同体”^①。这种思路也延伸到文学研究领域,“认为

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应当立足于地域文化与民族国家关系的基础上,在各种具体的知识话语的互动与斗争中,展现出地域文化建构的意义。”^[118]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这一研究模式嬗变的过程:首先,从环境决定论开始;其次,发展到将地域文化及其子系统看成是纯粹客观的客体来进行概念上的逻辑推演;最后将其看作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主观文化认同,认为区域文化是一个被建构的“命题”。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研究模式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陷,“这种强烈的‘去地域化’倾向所带来的解构力量,也容易让地域文化自身的丰富性受到斫伤”,“容易陷入到一种后现代史观的迷雾中”^[68]。

而“区域人文学研究模式”需从传统“天下”观念被颠覆以及其与知识分子自身的情感矛盾谈起。“1895年以后,大清帝国开始从‘天下’走出来,进入‘万国’”,天朝“渐渐被整编进了‘无处非中’(艾儒略语)‘亦中亦西’(朝鲜燕行使语)的世界,便不得不面对诸如‘亚洲’、‘中国’和‘世界’这样一些观念的冲击”^[2]。其实,关于中国的区域研究或者地方史研究,早在施坚雅那里发端。他的《城市与地方体系的等级结构》一文在三种意义上认为,城市最基本的功能是作为经济活动中心,“对帝国行政区划做周期性的调整和改组时,所采取的一个常规做法就是将崛起的商业中心城镇划为行政首府”^[145]。他非常强调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划分,将帝制中国分为9个地区,认为不同地区分别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中国”这一名称的同一性受到质疑。其后,郝贝尔的论文《750—1550年中国人口、政区与社会的变化》一文把唐宋到明代中叶整体的历史转移到各个不同区域中,又把原来同一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分为“国家精英”、“职业精英”、“地方精英或士绅”^②。这一研究模式刺激了宋代中国史研究重

①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而“想象体”,安德森认为“事实上,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种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② 这一研究的表述参见陈倩《美国汉学界区域史、地方史研究的兴起——以学术地缘化研究为例》,《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4期。

视区域差异的研究思路。^[6-7]如: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成果之一的是李国祁《中国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8],从传统背景、外力的冲击、政治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以及社会的现代化等5个方面集中探讨了闽浙台地区近代以来社会各个层面的变迁。此外,萧邦奇的《中国的精英主义与政治变迁:20世纪初期的浙江省》^[9]运用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对20世纪初期浙江省的精英主义与政治变化作了探讨。历史学、社会学领域这种重视区域空间差异性的研究思路,也被文学研究界吸纳。前文提及的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的设想便可窥一斑。

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是不不断“走向世界”的过程,以对“世界知识”的不断充实和完善为诉求,这一诉求背后有着多种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力量博弈的因素,也是全球化的历史转折使然。^[11]²⁴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在《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一文中就以“现代化”为基本立场,谈及了“文化角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认为“‘文化角度’包含了‘政治角度’,但又不止于‘政治角度’,文化的内涵要更宽阔,更丰富”,他们强调“作品中强烈的地方味与‘文化味’”,梳理了“文学中‘文化味’、‘地方味’比较强的作家群”。^[12]⁶¹⁻⁶⁴当然,从区域文化视角探讨新文学,也与1980年代中期“文化热”的兴起密切相关。前文提到的严家炎主编的丛书陆续出版,以及同时期区域性、专题性的文学史著作或者研究论文渐趋兴盛,都表明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开始走向整体研究及理论建构的层面。

1990年代以后,缘于某些复杂的原因,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的研究界出于对欧美话语的警惕,开始接受后殖民理论如东方主义的影响,对“中国”、“东亚”、“亚洲”的研究论述升温,并且引起了大陆研究界一部分学者的注意。我们开始怀疑将“中国”自绝于“世界”之外的思维策略,怀疑以“西方”为“世界”,并且“西方”永远处于优势地位的思维惯性。对我们而言,这些被用作文明的基本单位和历史的论述前提的概念太习以为常了。现在,它们开始面临着质疑和挑战。有关“中国”、“东亚”、“亚洲”作为问题和作为问题的“中国”、“东亚”、“亚洲”的论述由此产生,提出了如“东亚史”、“从亚洲出发思考”、“亚洲知识共同体”等话题。^[9-14]针对这一研究现象,葛兆光认为“超越简单的、现代的民族国家,对超国家区域的历史与文化进行研究,

是一种相当有意义的研究范式,它使得历史研究更加切合‘移动的历史’本身”^[4-5]。但同时又要警惕西方后殖民理论的方法与立场本身^[13],过度放大的范围有可能缩小区域或者亚区域文化的差异性,或者它们的历史延续性和文化同一性。

从整体上看,“区域人文学研究模式”将区域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概念,不仅指向关涉时间、传统的历时维度,也指向一种关涉空间、文化的共时维度。既有的研究成果^[14]表明了“地域文学研究模式”因为同一性的叙述规范遮蔽了文学现象的差异性和丰富性。而“区域人文学研究模式”恰恰能解决这一缺陷,其优点表现在注重区域文化研究的空间维度以及考辨历史、文化等诸多人文因素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互文”关系,可以呈现文学本身绚丽多彩的面相,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因同一性的叙述规范造成的文学现象的“遮蔽”。但在共时的维度将文学的范围尽可能拓宽,能够展现更为丰富的文学现象的同时,缺少了对研究主体阐释立场的洞察,以及对区域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背后隐藏的各种复杂权力关系的考量。因此,探讨吉尔兹的“地方知识”与区域文化研究的可能性便很有必要。

2 “地方知识”是阐释人类学大师克利弗德·吉尔兹在1970年代提出的概念。这一概念产生的背景有三:其一,人类学理论发展史上“普遍主义和历史特殊主义之间的方法之争”的延续;其二,全球化和现代化思潮背景下对“现代性”叙事框架的反动;其三,后现代思潮中科学实践哲学的勃兴。^[15]⁸⁷⁻⁸⁸尤其重要的是,这种观念有着浓厚的“后殖民”理论特征,是对作为传统科学观念的核心“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强调文化相对主义观,迥异于福柯将一切话语、知识都视为权力运作的结果的观念。^①它主要讨论人们如何透过“地方知识”深化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要求“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情境条件”:

这里所谓的“地方性知识”,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

① 译者王海龙以福柯作为参照系,认为福柯“是旧有思想和知识的颠覆者”,“吉尔兹则试图成为新的知识的再造和重塑者”。这种观念影响了此后的研究者的视域,多从建构的意义上把握吉尔兹的理论观点。参见克利弗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识观念。而且“地方性”(Local)或者说“局域性”也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它还涉及到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context),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视域等。^{[14] 36}

这一概念建立在大量的原始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吉尔兹通过走访巴厘、爪哇、摩洛哥等地的原始社区,研究他们的宗教、礼俗、法律、世界观等如何成为一种旁人不易理解但却能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文化价值,借此来考察被西方文化所忽视的边缘文化。吉尔兹的地方知识概念并非独创,它来自于“ethno-”相关的知识考察或者和“ethno sciences”有关的知识概念,用来表示这些知识与本土的种族、民族有关,离不开这些特定区域,或者在这些特定区域之外没有的、在这些民族或者种族之外没有的自然知识。倘若按照西方文化思潮的进程来看,地方知识不属于阐释人类学的认识论部分,而属于阐释人类学4个研究维度^①中的“后殖民与后现代话语”部分。所谓的“地方”不仅是地点、时间、阶级、事件等,更是一种音调,一种具有地方色彩的事实表征与道德想象。

随着对知识观念认知的更新与深化,知识观念的特征得到了确认。一般认为知识在本质上是活动或实践过程的集合,把科学或知识当做动词来理解;科学或知识是一项公共的事业,知识的有效性必须以别人的实际认可作为前提,知识主体的实际参与很关键。换句话说,知识的有效性涉及主体间性的问题,有效性的实现依赖说服与劝导,认同、组织之类的权力话语与修辞手段。^{[14] 37}恰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因吉尔兹文字的艰涩和表述方式的殊异,对吉尔兹的理论及其阐释在当代学术界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误读”地运用在所难免。不过,需要明确的是,在理解运用“地方知识”时拥有什么样的立场很重要。我倾向于从批判的意义上理解,“知识”是随着主体创造性参与而形成的东西,不是既成的脱离特定语境依然有效的东西。

与“地域文学研究模式”所秉持的文化观念相近,吉尔兹倾向于把文化当作一种符号系统使用,强调文化对于人深远的精神影响“我所坚持的文化概念既不是多所指的,也不是模棱两可的,而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

度”^{[17] 103}。而区别在于,努力尽可能地使艺术、宗教、意识形态、科学、法律、道德、常识等观察社会行动的符号层面^{[17] 33-34}的形式分析“精细化”,避免“地域文学研究模式”过于宽泛和琐碎的弊端。吉尔兹“重申文化是积累的总类型符号系统,是可以被条分缕析、分层探讨的”,“昭示符号是模糊地传承的,符号的融混驳杂不断组合的特征使其具有晦涩性,它们携带的意义势必需要阐释”^{[18] 21},这就涉及吉尔兹的研究方法——深度描写和深层分析。

被誉为吉尔兹“深度描写”的经典文章是《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17] 471-511}通过斗鸡游戏来探究巴厘岛的传统习俗、文化趣味、社会秩序、价值观、上层社会的政治斗争等的潜在制约,进而探究一种地方性的文化价值体系如何影响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行为的细节。需要说明的是,吉尔兹“深度描写”的概念来自于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关于两个男孩眨眼睛的行为分析。而这恰是典型的人类学方法,借此说明任何细微行为所蕴含的文化符号的复杂性以及其“所指”和“能指”之间排列组合所能具有的可能复杂关系“是通过极其广泛地了解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着手进行这种广泛的阐释和比较抽象的分析”^{[17] 24}。同时,吉尔兹强调“深度描写”和观察方式的特定化、情境化、具体化,区分了可观察的行为,现象性观察和浅度描写,确立了长期的、小范围的、定性在上下文背景中的理论前提要求。^{[18] 21}由此,我们可以将这种观念类比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吉尔兹的“地方知识”将文学视为一种文化符号体系,强调用“深度描写”细读文本及相关文化行为,力求呈现每一种知识的形成与特定的历史情境的关联。这样就克服了“区域文化”既有模式的弊端:比如干巴巴的概念推演、缺乏细部呈现以及一味地在文本中勾连不同权力话语博弈的链条,或者将“区域文学”视为一种话语的建构,将区域文学的内涵通约化或均质化等。同时,观察方式的要求涉及文学研究者的立场。吉尔兹主张用一种“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18] 19}来观察文化,他表述自己的经验时说:

我都试图竭我所能去释其真谛而不仅以局外人自况,亦不视自身为一个稻农或一个部落的酋长,然后以己之思去为其设身处地;而是勉力搜求和析验它们的语言、想象、社会制度、人

^① 阐释人类学的4个部分是对文本的研究、话语研究、认识论与知识结构、后殖民与后现代话语。

的行为等这类有象征意味的形式,通过这种研判判断,来验证在每一个社会中人们是如何在他们自己人中间表现自己以及如何向外人去表现自己。^{[1][75]}

这里着重强调的是文本阐释者的“主体参与性”。不仅要深入文学文本和文化行为中,采用我们经常所说的“同情之了解”的态度,以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设身处地的解析,还要用“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来加以阐释。这种阐释态度也是我们文学研究者应当借鉴的方式,也是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既有研究模式中所缺乏的东西,单一具体文本解析需要这种“主体参与性”阐释。

近年来,国内研究界也开始关注“地方知识”这一概念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并将之运用到文学个案研究中:刘小新针对华文文学一体化的趋同走向引入了“地方知识”的研究范式,用来弥补“大同诗学”对于异质文学的遮蔽^{[1][136]};李怡主张将“地方知识”的概念贯彻到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借此反思长期倡导的“世界性”的眼光和方法^①;葛红兵、高霞借用“地方知识”的概念,提出将小说视为一种叙事形态的“地方生活”,小说的诸多细节为地方文化提供了具体文本,借此了解地方文化的作用机制^{[2][39]};凤媛借用“地方知识”提出的“深描”法,挖掘江南文化对于文学文本和文化行为的深远影响力,借此凸显江南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性审美经验的价值。^{[3][67]}这些文本探索和实践既证明了“地方知识”与区域文化研究有了契合的可能性,又启发着笔者对20世纪陕西文学研究范式的思考。

3 倘若我们检视一下陕西文学的发展状况^{[1][35-68]},尤其是20世纪陕西文学,我们会发现,它愈来愈受到学界关注。单就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个茅盾文学奖获奖者就构成了其他地区无法企及的文坛风景。可以说,20世纪陕西文学在我国文学格局中的坐标意义较为特殊。尤其在“全球化”语境下,有着鲜明地域特征的作家,对本区域文化建设的承载作用越来越明显。按照流行语来说,谁谁是某某地方的代言人,他们也是政府部门实施“区域文化”战略的一张名片。比如张炜之于山东“齐文化”的弘扬;王安忆之于上海海派文化的重现;叶兆言之于南京六朝古都文化的书写等,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人之于三秦文化也概莫能外。

从地理分布上看,陕西处于我国东西部过渡地区,以秦岭为界具备我国南北方两大自然、人文地理区域的特点。历来分为陕北、关中和陕南三大板块,

各区域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存在着差异,被称为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一个典型实验室。对此,贾平凹有着深刻的见解:

陕北,原为黄土堆积,大块结构,起伏连绵,给人以粗犷、古拙之感觉,这一点,单从山川河流所致而产生的风土人情、又以此折射反映出的山曲民歌来看,陕北民歌的旋律起伏不大而舒缓悠远。相反,陕南山岭拔地而起,弯弯有奇崖,崖崖有清流,春夏秋冬之分明,朝夕阴晴之变化,使其山歌忽起忽落,委婉幻变。而关中,一马平川,褐黄凝重,地间划一的渭河,亘于天边的地平线,其产生的秦腔必是慷慨激昂之律了。^{[2][131]}

应当说,陕西这一区域拥有其他区域无法企及的丰富资源,包括人文历史、地理旅游、制度风俗、经济科技、艺术文献、器物建筑等多种元素,这样“三秦文化”就具备了多重语义空间,可以从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等视角切入。从文化传统上看,一方面“三秦文化”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历程中,已经成为民族传统中的一种重要的精神符号,提到三秦大地,意味着一种黄土情结,厚重、本色的审美经验油然而生;另一方面“柳青开创了陕西文学的精神面貌,陕西几代作家的创作中体现出的精神品格都有许多师承,柳青的基本精神特征在陕西几代作家的创作中都有鲜明地体现和发扬”^{[2][52]}。从既往研究看,多从人文地理、审美趣味、文学风格等方面论及“三秦文化”对于文学的影响。随着全球化语境的来临,这种传统的审美经验是否已发生变化,特别是陕西作家如何重新面对“三秦文化”则研究得不够;研究方法上仍逃不脱区域文化研究的模式。

倘若把“三秦文化”作为一种“地方知识”,这种研究将会呈现别一局面。第一,作为一种“地方知识”的“三秦文化”,按照吉尔兹的观点,就是将文化视为一种不断发展绵延不断的知识,并且是人们之间得以沟通、绵延、传续的符号体系,这样不仅能关注到“三秦文化”自古以来的“传统”,还能通过“深度描写”捕捉到它得以形成的具体语境,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现代社会重塑知识的渴求,能够有效地传

① 李怡在《世界知识、地方知识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少数民族知识、地方知识与知识等级问题》(《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2期)等文章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达不同时代语境下的文化和知识。这样,不仅张扬了“三秦文化”的影响力,还能够探究“三秦文化”是如何演变的,为探究其背后悠久的历史传统提供了历时的眼光。同时,从横向上,传统涉及的风俗、宗教、艺术、历史等在内的文化符号又一起构成了彼此呼应的有机整体,不仅契合了“三秦文化”固有的丰富文化资源,也有助于从更宏观的背景切入命题。

第二,“三秦文化”视野中的文学,包括有着陕西地域特色的文学文本和作家们的文化行为等,也可视为“三秦文化”作为一种地方知识的文本性符号,这样就拓展了“三秦文化”的影响范围,又在全球化语境下凸显出“三秦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性审美体验的价值。吉尔兹在谈及作为一种文化体系的艺术时指出:

在任何社会里,艺术的定义更不可能全然纯属美学范畴。它事实上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由美学力的纯然现象所表示的主要问题是,艺术用什么样的形式,以及何种可以导致技巧的结果来表现;怎样把它融入其他社会化活动的模式,如何使之和一些特定的生活范式的前后关联协调导入。而且,这种赋予艺术客体以文化意蕴的导入,总是一种地域性的课题。^{[18] 124-125}

文学作为艺术的一个分支,区域文化的影响力更大。因此,在讨论“地方知识”与区域文化研究中,需要重申几点要素:运用“深度描写”法对文学文本进行解析时,一方面要注意文本细节和文化行为的微观解剖,另一方面要用那种“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深入文本内部去探究作家的创作,进而摸索出其背后的文化脉络,做出深刻到位的文本解读。比如,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代表的“三秦文化”视野中的现实主义文学为中心,将其放到新时期中国社会时代生活的历史进程中来考量,我们发现了陕西地域特色的文学文本和作家们的文化行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民众生存个体之间的相互冲突,历史因果性与偶然性的相互撞击,社会私人意向或个体理想与公共价值之间的冲突等。同时,还可进一步将“三秦文化”作为一种地方知识的文本性符号,彰显这些作家作品的社会文化史、思想史和文学史意义,挖掘其对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与不足,开启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世界性视域,这样就拓展了“三秦文化”的影响范围。

以清末民国时期陕西旅外学生创办的《夏声》月刊、《秦钟》(《共进》)杂志为例进一步说,既往的研究

大多将它们置于民族主义思潮的语境下加以分析,凸显清末民国时期陕西知识分子在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参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叙事立场,但也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三秦文化”作为一种“地方知识”在旅外的知识分子那里的复杂情感认知。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深度描写”法对这两个刊物产生背景和基本面貌加以呈现。从刊物名称看,《夏声》《秦钟》仍然带有“三秦文化”特色,不同于东南沿海留学生创办的刊物,如《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直接以省籍为名,与晚清西方地理学概念输入传播的范围相关,也反映了清末民国时期陕西社会思想闭塞,教育滞后,学生接受新思潮的速度比较慢。比如1923年12月25日,谢幼石《我不愿瞎活了》^[24]一文中这样回忆老师对自己的教诲:

要想做人,小学生弟子规是个好书;大学生小学集注是不可不读。……现在一般吃了洋药的学生,说旧道德有些不可行,我想没一句不可行的;若遇到不可行的地方,孔圣人删诗书,订礼乐时,为甚不把他删了哩?难道说现在的人,比孔子都能啦?这真是洪水猛兽,世道不古了!

从中可以看到三秦文化远离文化中心的特殊语境:学生受到旧学说的制约,新学说输入陕西并产生影响的难度比较大。从刊物内容上看,两刊都以本省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状况为主,以主张提倡桑梓文化、开通风气为宗旨。《夏声》月刊就以“开通风气,剪除弊俗,灌输最新学说,发挥固有之文明,以鼓舞国民独立之精神”为宗旨,整体倾向上是一种接受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当我们以一种“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来看,《夏声》月刊是1908年2月26日由陕西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的,而《秦钟》(《共进》)杂志是1920年1月20日由旅居北京的陕西大学生所创办。刊物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都以陕西旅外的学生为主体,同乡之谊是刊物得以创办的基础。也就是说,刊物创办建立在对“三秦文化”的认同上。这可从前文提到刊物的命名和宗旨上窥见一斑。在清末民国民族主义思潮涌动的语境中,这群旅外的学生表现出了对于“三秦文化”的情感认同,并试图在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的三秦大地做出自己的一番努力:

当我归来的时候,想在陕西整顿教育,小则整顿华县的教育,一进潼关,便不敢倡谈教育,只想整顿学校,华县的学校;及到这里,连学校也不敢说了,只想整顿咸中,帮助教高整顿;再一开步,连咸中也不敢胡说了,只想整顿咸中的教务,帮助校务整顿;直到现在,连教务,也不敢

胡说了,只想整顿一部好中国史,一部适用的国文文法和话法,一部中国国文读本,来供我教授。再后,恐怕连整顿也不敢高谈了,就会要东剪西贴,想出蒙混学生的法子!我的领土照这样缩减,真好像鼠入了牛角,等到二三年后,你们要拿六七百倍的显微镜看呢!哦!显微镜中的世界,有时候也招惹一般好奇的先生注意。^[5]

从行文目的看,作者有感于现实三秦大地的衰落和落后,写信给旅京的共进社同仁哭诉。其中,作者爱护乡梓的拳拳之心以及有志向无处施展的苦楚跃然纸上。与此相对应的,若从历史的角度考察,20世纪陕西文学一般公认是以1940年代延安文学为开端^[6] 111-113。也就是说,陕西文学没有“现代史”而只有“当代史”。这也回应了造成现代时期的“三秦文化”的特定语境的因素:远离文化中心,以及当时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封闭。

第三,作为一种地方知识的“三秦文化”,是建立在反思全球一体化为表征的现代性的前提下。冯骥才先生曾在《谁在全球化中迷失?》一文中充满担忧地预测,“这个被全球化一统天下的文学,却永远失去了深厚与多彩的文化血肉,失去不同文化的魅力与神秘感,失去各个地域独有的匪夷所思的思维特性”^[7]。在这种情景下,以一种地方知识经验参与到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并对其发展历程中出现的偏颇加以纠正。所以,新时期文学以来,大多数作家唯西方思潮马首是瞻,三秦大地上仍有一些作家如陈忠实、贾平凹等对此保持着谨慎态度,切切实实地“深入生活”,充满热情地书写能够代表“三秦文化”的文学作品。他们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一方面形成了对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有效接续,一方面创作中所反映的人的生存问题,思考人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问题,也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共同母题。应当说,“全球化”作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得地理单位拆去空间上的阻隔,区域间流动、互动逐渐频繁;另一方面,承载着区域文化特色的文学因为语境的变迁也互相模糊了边界。但是“具有区域文化自觉的作家仍然还会从典籍、文献、民间传说、生活习俗等历史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通过区域文化创新,传承区域文明”^[8]。

4

前文谈到“地方知识”的特征时曾提及:

其一,“地方知识”是与“西方知识”处于相对的两极,知识的地方性缘于同“西方知识”的关联;其二,“地方知识”还指代与现代性知识相对照的非

现代知识,所谓的非现代性有两种理解,历史的维度与当下的维度,前者认为“地方知识”总不是现代仍然起作用的知识,后者认为“地方知识”所发挥的作用只局限于当地,而不是现代社会;其三,“地方知识”一定是与当地知识掌握者密切关联的知识,不能脱离具体语境的知识。^[9] 88-90 然而,随着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与“地方知识”相关的“当地”便有了阐释的多义性,这也是研究者容易“误读”吉尔兹的原因所在。“当地”由某个具体的地理坐标变成了具有动态的、过程的文化特性,空间与时间联系起来,认为“地点就是一种特定时刻的相互交叉、空间化的社会关系”^[10] 52。

因此,针对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摆脱西方知识/地方知识这一“二元对立”的模式,让其回复到互相支撑、激发的状态中,这就需要作为“知识”创造主体的人本身有着自我精神建构的能力,尤其注重培养自我意识的成长,“在辨别种种‘知识’的姓‘西’姓‘中’或者‘外来’与‘本土’之前,更重要的是考察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将独立人格、自由意志与人的主体性作为自觉的追求”^[11] 109。康德在描述文艺活动中自由“精神”的意义时说“精神(灵魂)在审美的意义里就是那心意赋予对象以生存的原理。而这原理所凭借来使心灵生动的,即它为此目的所运用的素材,把心意诸力合目的地推入跃动之中,这就是推入那样一种自由活动,这活动由自身持续着并加强着心意诸力。”^[12] 159-160 简单点说,我们呼吁每一个体不仅有“拿来主义”的眼光和魄力,更要有饱满的自我意识、全新的艺术感受力、能动的主体参与精神。同时,我们也要警惕过度强调阐释主体的参与、体验而陷入“过度阐释”或者主观主义的怪圈。

总之,一种新的研究模式的确立,需要研究主体具备相应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运用吉尔兹的“地方知识”概念来探讨区域文化与文学,需要融会贯通文化地理学、文学、历史学、文艺学、民俗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多领域的相关知识,并以此为基础,根据研究对象找准文学与区域文化之间的契合点,进而构造一个有着内在同一性的研究范式来。同时,对于某一特定区域文化,不仅需要实证式的学习与考辨,更需要对其存在样态进行深入的田野考察与体验,将实证与体验尽可能地完美结合在一起。

参考文献

- [1] 阿里夫·德里克. 后革命氛围 [M]. 王宁,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2] 金克木. 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 [J]. 读书,1986(4).

- [5] 凌云岚. 五四前后湖南的文化氛围与新文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6] 程美宝. 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 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 [7] 邓伟. 地域文化建构与民族国家认同——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的另一思路 [J]. 文艺理论研究, 2006(4).
- [8] 凤媛. 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地域文化——兼及对江南文化和文学研究的一些思考 [J]. 文艺理论研究, 2011(5).
- [9] 葛兆光. 宅兹中国: 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10] 施坚雅. 城市与地方体系的等级结构 [M] // 施坚雅.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 王旭, 等译.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 [11] 李国祁. 中国区域研究: 闽浙台地区, 1860—1916 [M].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1982.
- [12] ROBERT KEITH SCHOPPA.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13] 贺桂梅. “新启蒙”知识档案: 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14] 钱理群, 陈平原, 黄子平. 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 [M] // 黄子平, 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 [15] 杜赞奇.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M]. 王宪明,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16] 周晓风.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集刊: 第1辑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 [17] 吴彤. 两种“地方性知识”——兼评吉尔兹和劳斯的观点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7(11).
- [18] 盛晓明. 地方性知识的构造 [J]. 哲学研究, 2000(12).
- [19] 克利福德·格尔兹. 文化的解释 [M]. 纳日碧力戈, 等译. 王铭铭, 校.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20] 克利福德·吉尔兹. 地方性知识: 阐释人类学论文集 [M]. 王海龙, 张家瑄,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 [21] 刘小新. 大同诗学想象与地方知识的建构——华文文学研究的两种路径及其整合 [J]. 东南学术, 2004(3).
- [22] 葛红兵, 高霞. 小说: 作为叙事形态的“地方生活” [J]. 文艺争鸣, 2010(7).
- [23] 李继凯. 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
- [24] 贾平凹. 王蓬论 [M] // 贾平凹. 朋友.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5.
- [25] 雷涛. 柳青: 宝贵的精神资源 [J]. 小说评论, 2005(2).
- [26] 幼石. 我不愿瞎活了 [J]. 共进(52), 1923-12-25.
- [27] 通信: 野俦致克强 [J]. 共进(6), 增刊, 1921-12-25.
- [28] 梁璐. 地理学视角下的文学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当代陕西本土文学为例 [J]. 人文地理, 2007(6).
- [29] 郭淑梅, 迟子建. 文学的区域文化创新品牌 [J]. 黑龙江日报, 2011-12-14.
- [30] 休·拉弗勒斯, 陈廌. 亲密知识 [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中文版, 2003(3).
- [31] 李怡. 世界知识、地方知识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 [J]. 天津社会科学, 2010(2).
- [32] 康德. 判断力批判: 上卷 [M]. 宗白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责任编辑 张积玉

Local Knowledge and Form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An Approach to the 20th-century Shaanxi Literature and Regional Culture Study

ZHAO Li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Shaanxi)

Abstract: Geertz's "local knowledge" and regional culture studies is likely owing to certain defects between the two patterns of cultural study and corresponding views of literary study. "Local knowledge" regards literature as a system of cultural symbols and emphasizes explicating the text by "deep description" and other cultural means to presen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ormation of each kind of knowledge and particular cultural situation. Meanwhile, Geertz insists on observing culture from "a culture-holder's internal perspective" and stresses "subje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text interpreter. From this angle, Shaanxi culture as "local knowledge" involves both historical "traditions" of its formation and offers the particular context for its formation to capture by "deep description". In this sense, literature to Shaanxi culture can be taken as textual symbols of the culture as local knowledge. This done, we can expand the domain of influence of Shaanxi culture and highlight its value of localized aesthetic experience.

Key Words: local knowledge; regional culture; 20th-century Shaanxi literature; global context